

東歐的變局：意義與影響——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共黨組

一、時 間：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地 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館一樓簡報室

三、主 席：張兼主任京育 記 錄：龍舒甲

四、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章陵先生 王兆徽先生 尹慶耀先生 孔令晟先生 石紹京先生 朱一萍女士 周陽山先生

陳一新先生 陳力生先生 符史生先生 曾永賢先生 裘孔淵先生 葉陽明先生 劉崇座先生

蔡政文先生 賴金男先生 蘇 起先生

(二)本中心參加人員：

周 煦先生 趙春山先生 葉伯棠先生 畢英賢先生 吳安家先生 洪茂雄先生 段家鋒先生

劉天均先生 王承宗先生 李玉珍女士 龍舒甲先生

五、主席報告：

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請各位來參加擴大學術討論會報，討論關於東歐的變局，它變化的意義與影響。自從戈巴契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之後，蘇聯本身實行所謂的「改造」、「公開化」，對外政策方面也有所謂的「新思維」。蘇聯本身的變化影響到蘇聯與中共的關係、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引發了東歐的變局。尤其最近這段時間以來，可以說除了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之外，其他東歐的國家變化大而且快速，有點使人覺得眼花撩亂。究竟東歐將來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對外關係上會產生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如果產生更多的變化，蘇聯會持什麼

樣的態度，將來東、西歐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更多的接觸整合而更安定更進步呢？還是說會由於東歐也有所謂的少數民族的問題、邊界的問題、政治不安的問題，也帶來東、西雙方另外一種性質的不安情勢呢？

東歐本身的變局，從中共來看，它持什麼樣的態度？東歐的變化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中國大陸的變化？東歐的變化對我們有什麼直接的意義？我想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加以認真的探討。所以今天，一方面邀請我們中心以外的若干位學者專家來給我們指教，我們本中心的同仁也提供他們的淺見，跟各位交換意見。

我們這次會議的進行是採取引言報告的方式，根據討論的主題來進行討論。所以引言報告，事實上，是一種拋磚引玉的性質，希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有充分的時間來發表意見。雖然說在自由討論的時候，每人每次只有五分鐘，但是我們希望可以針對別人的意見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發言。因為在一般的會議很容易每人發言一次，而意見並沒有充分的表達，我們希望可以針對別人的意見再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子的話，我們也許可以有一個更透澈的討論。現在就請洪茂雄先生同葉伯棠先生分別地作引言報告。先請洪茂雄先生。

六、引言報告：

洪茂雄先生（國研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東歐變局的意義

最近半年來，東歐國家的變革，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頗令人感到意外。就變革的快速來說，自八十年代開始，波蘭「團結工會」異軍突起，首先發難，向波共政權挑戰，足足等了七年，始有重大突破，而在東歐成立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匈牙利從一九八八年五月起，花了一年五個月的時間，比波蘭更徹底的進行「改造」；緊隨著匈牙利之後，東德、保加利亞和捷克，則更縮短時間，僅僅在一個月之內，即發生巨變。這種「加速度」的變局，幾乎令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感到不可思議。就變革的幅度來說，其動搖共黨統治根基，可謂創下國際共運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其中最受矚目者：如共產黨放棄權力壟斷，刪除憲法中保障共黨「領導地位」的條文；承認政治多元化的事實；容許反對勢力「奪權」的抗爭；以及共黨領導階層大換血，甚至「改頭換面」等。東歐國家這樣快速轉變，到底顯示什麼意義。謹就下列四個面向扼要地提出個人的看法。

首先，就政治意義而言：

- (一) 證明共產主義已告破產，由共產主義築起的「紅色大廈」正搖搖欲墜，在倒塌之中。
- (二) 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時期宣告落幕，憲法中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之保障條款，已被刪除。
- (三) 過去在東歐的自由化運動均獲得平反，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以及一九八一年「團結工會」被鎮壓等。從這些事實看來，北平「六四天安門屠城事件」的平反，也是時間問題。

其次，就經濟意義而言：

(一)證明社會主義體制實行四十年一敗塗地，市場經濟顯然優於計畫經濟。

(二)顯示東歐國家光是實行經濟改革不足以挽救危機，從五、六十年代以來，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東德等國家均先後進行經改，但績效不彰，到頭來還是要徹底進行政治改革。

(三)共產黨「官僚體系」特權橫行、貪污腐化，窒息了經濟發展。

再次，就國際意義而言：

(一)促進東、西方關係的緩和，有助於冷戰的結束。

(二)有助於東、西歐進一步的合作，如戈巴契夫所倡議的建立「歐洲共同之家」，或西歐的大「歐洲共同體」的統合，其實現並非不可能。

(三)加速東、西方的裁軍進程，北約與華約的軍事對抗可望日益減低，而政治關係將愈為重要。

最後，就社會意義而言：

(一)東歐基督教會的角色舉足輕重，過去共產黨試圖消滅宗教，但四十年來，非但沒有消滅，反而成為反對勢力的底護神，最終迫使共黨放棄權力壟斷。

(二)在社會多元化的情況下，社會自主性提升，進而有效突破共產黨的禁忌。

(三)共黨威信掃地，聲望一落千丈，黨員大量流失，成為最不受歡迎的團體，根據民意測驗顯示，如果立即舉行自由選舉，共產黨只能獲得百分之廿的得票率。

(四)環保意識高漲，反對勢力名正言順，有效地通過「環保」運動，整合社會力量，過程理性、和平，手段高明，其中以保加利亞的「生態公開」組織最為突出。同樣地，共產黨亦出乎尋常，相當理性的面對現實，使政權和平轉移。

接著，我也想簡單地提出一些問題請各位作進一步的觀察或探討：

(一)共產黨將何去何從？是否已走進死胡同，或者變化其體質來適應民主潮流？

(二)東歐的變革究竟會走多遠？有無可能走回頭路？

(三)東歐這種巨變，到底對中國大陸帶來多大的衝擊？甚至於東歐各國的變革對於我國在目前所要推展的實質外交會具有什麼意義？在什麼條件下，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把握？

葉伯棠先生（國研中心研究員兼中國大陸組召集人）：東歐情勢劇變對中共的衝擊

東歐情勢劇變對中共的衝擊甚大。「六、四」天安門慘案以後，中共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和平演變」，現在却面

臨東歐大部份國家接受「和平演變」。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不到半年之間，東歐情勢變化之大，對中共保守派而言，真有驚心動魄，談東歐問題而色變。

「六、四」慘案後，中共面臨西方國家譴責和經濟制裁，希望加強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合作。東德共黨總書記何內克曾在今年七、九兩月，分別派遣政治局委員什鮑斯基和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柯倫茲訪問北平，表達東德政府對中共的支持。當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非常感謝何內克的盛情，他公開讚揚東德是東歐國家第一個站出來，「鮮明地支持『中國』的國家。」誰能料到在兩個月後，東德情勢劇變，柏林圍牆開放，東德政府兩度改組，何內克被開除黨籍，並以貪污罪受到司法起訴，繼任人柯倫茲所提的改革方案未能滿足人民的願望，也被迫下臺。東德共黨改換名稱，東德新政府取消對中共「六、四」事件的支持。

中共對東歐情勢發展的反應，大致採取三種作法：（一）保持緘默。九、十月之間，東歐風暴初起，其發展如何無人敢逆料，中共對東歐的變局採取觀望的態度，既不作報導，也不加評論。（二）淡化東歐情勢。十一月十日，柯倫茲政權被迫開放圍牆，東德人民爭先恐後，以排山倒海之勢進入西柏林，呼吸自由民主空氣。人民日報卻隻字不提，只是報導東德政府改組，堅持社會主義，儘量淡化東歐情勢發展。（三）誤導新聞。中共靠說說起家。「六、四」慘案更證實我們的看法。像袁木之流睜眼說瞎話，已經被全世界公認為卑鄙的撒謊者，無耻之極。東歐情勢發展之初，十月二日，中共瞭望周刊突然刊載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五日鄧小平接見捷共中央總書記雅什克，重申中共與各國共黨關係四項原則，其中強調「一個政黨不能用任何形式干涉別國政黨的內部事務」，「一個政黨不能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標準，去指責或攻擊意識形態同自己不同的政黨」。這種作法，顯然是誤導新聞。

李鵬對東歐情勢發展判斷錯誤。十一月十四日，李鵬在巴基斯坦答覆記者詢問有關東歐情勢時，承認「東歐情勢變化對中國有影響」，但並未進一步說明影響到何種程度，只表示不干涉別國內政。惟他強調，東歐情勢是好是壞，有待進一步觀察。但他却奉勸有些人「不要高興得太早！」依照李鵬的判斷，東德共黨不可能片面地接受人民改革的要求，讓出統治權，事實發展完全出乎李鵬意料之外。現在不僅東德、捷克，連一向保守的保加利亞共黨政權也出現極大的改變。

至十一月底，東歐情勢發展完全出乎中共意料之外，東德、捷克和保加利亞共黨政權紛紛更迭，中共不得不表態，只好重申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事實上，中共也沒有能力干涉東歐各國內政。十一月卅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金桂華表示：「東歐國家的人民終究會從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到符合本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希望這些國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語氣顯得多麼無奈。

中共對東歐突變的惶恐，其原因有三：

一、國際「大氣候」的變數。今年九月八日，李鵬認為「六、四」慘案是國外的敵對勢力利用各種機會實現其「和平演變的戰略」。現在東歐的突變確是順應「和平演變」發展的歷程，從匈牙利改國號；波蘭實行多黨制；東德、捷克和保加利亞共黨領導人紛紛下臺，東德共黨亦更改名稱、鐵幕已經拆除，共黨淪為少數黨，這種情勢必然引起中共保守派惶恐異常。

二、中共所以惶恐是因為，東歐情勢發展屬於「質變」的發展，其改變的動力是共產主義制度本身的失敗，壓制人民創造力，剝奪人民政治自由，抑制人民的生產力，導致生產衰退，生活水準低落，東歐人民經過長期的醞釀，由量的漸變發展到質變，要求廢除共產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切問題。

三、東歐劇變已經引起上海各高等院校注意，變成當前大學生熱門話題。他們為了瞭解更多東歐情況，紛紛爭相閱讀各種海外報刊。中共共青團第一書記宋福德最近在共青團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承認，中國大陸青年對東歐問題產生了「困惑和疑慮」。他呼籲「通過正面教育、輿論宣傳，引導和幫助團員們全面認識中國國情，辯證地看待當前形勢，有效地防止和克服服在改革，民主、法制等問題存在的超越階段的偏激情緒和恐懼失望的消極心理」。從這些話中，透露大陸青年思想問題的嚴重性。

中共的對策，為了防範東歐突變的衝擊，中共也採取兩項行動：

一、加緊控制大陸輿論，全面管制新聞。

二、內部秘密下達指令，統一對東歐問題的看法。

根據秘密文件透露，中共主張繼續保持與東歐國家的正常關係。至於黨的關係還要觀察、要慎重。在公開場合，強調不干涉其他政黨的國內政策。該文件透露：「對東歐的變化在國內採取不報導的方針不行，認不清形勢，搞過頭的報導也不行，要強調東歐的黨政要放棄社會主義這一點」。現在東歐情勢已遠遠超過中共的預測，東歐劇變帶給中共無限的憂慮和困惑。

七、自由發言：

蔡政文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系主任）：

東歐的變化，對國際局勢的最大影響在於兩大集團關係可能的發展。就東、西德的發展而言，這次東德開放圍牆，對其自身較為有利，因為她展示出比較開放的形象。另一方面，東德人民跑到西德，如果西德無法安置時，他們還可以回到東德去。過去設立圍牆的目的，是要讓東德人民不要跑到西德去，在一九五〇年至五九年裏，東德人民跑掉了二百九十萬人，在那個時代來講，東德很多的技术勞工去到西德，對東德的影響很大。現在，東德人民不再需要以難民的身份過去；同時，也不致造成東德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相反地，西德必須要審慎的面對東德的發展，東德民主化的趨勢，或者是東德人民的力

量對東德政府的影響力及蘇聯的態度。

至於東、西德的統一在目前不是西德片面可以說的，而是在於蘇聯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態度和美國的態度。因為如果他們兩邊統一的話，依照歐市的假設，是希望先有歐洲的統合，而後才是東、西德的統一，兩德統一之後再加入歐市，這樣才較為安全。不過，這都要看以後的發展，所以西德現在是要逐步的來。

至於兩大集團的關係，很多人都關切蘇聯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戈巴契夫說他不干預。事實上，兩大集團可能的演變是，戈氏可能想把東歐集團由權威性的集團變為非權威性的集團。換句話說，就如同北約組織一樣，美國是一個領導國，其他的西歐國家都有自己獨立自主的意願，自己的體制。同樣，在東歐集團裏面也讓他們走向這個地步，但是不會讓東歐國家與西方集團結合在一起，因為這樣會造成體系的不平衡，體系一不平衡，就容易造成戰爭的爆發。同時，如東歐變成一個非權威性集團，對戈巴契夫也有利。一方面，戈氏保存了開明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讓戈氏在國內不會被推翻。反之，當東歐國家都脫離了華約，而戈氏又不介入的話，那他一定會被推翻掉。另外，就東、西歐的發展和東、西德的情況，我們可以得到幾項經驗：

一、圍堵政策證明有局部的正確性。共產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政經發展，它會慢慢地改變、溫和。

二、功能主義和政治發展理論也被證明是正確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平行發展，也獲得了證明，經濟愈發展，會帶動自由化。滙合理論曾被批判是不可能的，如今也證明有一些可能。就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應該如何？我想，如從東歐國家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必須每隔十年有一個爭取自由化的運動，四十年有四次。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現代化，十年後至今是第一次。將來可能還會有三次。有臺灣的加入，可以讓它快速發展。我們怎樣加入，也不必太興奮，因為對東、西歐的發展，如果太興奮的話，過度的干預，對我們可能帶來很大的麻煩。因此要非常謹慎。美國這次不敢對東歐積極的介入，而先和戈巴契夫見面，免生誤解。我們也是同樣的，在海峽兩岸的關係裏，要維持謹慎的態度，勿過度的介入而引起雙方的誤解，進而造成局勢的緊張。所以，滙合理論應是我們主要的政策，而最主要的是促成中國大陸自由化與民主化，其次是要讓海峽兩岸關係的政策能滙合到一個中間點。要如何讓它們滙合，則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認為在統一和獨立的過程中，「一國兩制」及我們目前的地位，應找一個中間點，大家平等共存於國際社會，關係正常化以後，慢慢減少縮短政治制度的差距，朝統一邁進，最後走向自由民主的方向。這點可能可以作為共識。

主席：

過去蘇聯和東歐的關係，基本上是盟主與同盟國之間的關係。蘇聯因為軍力強大，在若干地方有駐軍。同時，她的經濟力量比較強，在若干地方給予東歐國家一些優惠。因此，東歐共黨有若干不是自發性的，也有蘇聯的扶持在內。所以，蘇聯

和東歐的關係，尤其是歷史上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如果將來蘇聯的軍隊要從東歐撤退，同時蘇聯也表示了，不再干預東歐國家內部的情勢，那麼蘇聯共黨與東歐共黨或其他政黨的關係，也不會像過去那樣是所謂「父子」的關係。如此，蘇聯將來究竟用什麼辦法來維持像美國與西歐各國一般比較平等的同盟國關係？

蔡政文先生：

我想，這個變化應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過去這些國家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如今變成一個領導國的情況下，只要讓東歐各國在對外政策上和政體上有較為獨立自主的選擇，而後在同盟國的關係上只要不脫離華沙公約組織，大家還是在組織裏面，大家以較平等的方式來對話，可能至少在表面上維持這樣子情形，然後慢慢地去演進。相信應可逐步地演進出一個規範。蘇聯會放，但要放到恰到好處的程度；因此，蘇聯應會給予東歐各國適當的警告或讓它們知道限制在那裏。現在是怎麼放的問題。

主席：

將來蘇聯和東歐的關係究竟如何演變將影響到東、西歐，也將影響到世局。以波蘭為例，在歷史上波蘭與俄國的關係不是那般融洽，先不論其領土糾紛。假如波蘭認為蘇聯既允其自由，便因此而參加西歐集團。波蘭在經濟上與西歐也有關係，在文化上、宗教上也有比較密切的關係。當然，從政治上來說，波蘭也許不應作這樣的決定，因為可能引起蘇聯大規模的干預，可是從情緒上、從經濟上，波蘭可能走這樣一條路，萬一波蘭這麼做，而蘇聯又不以軍事干預的話，那蘇聯如何將波蘭留在經過改造的華約集團裏？當然，今天兩大超強都還希望維持這兩個集團，而不願意因集團中發生任何的變化而引起兩超強間的直接衝突。不過，政治的問題，有時不是可以讓個人來隨意安排的，有時它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情緒。所以，我便提出來作為大家討論的議題。

段家鋒先生（國研中心研究員）：

在整個東歐問題中，東德是頭，因為她不只國民平均所得最多、武力最強，而且與西德統一趨勢中，對今後影響也最大。所以，在東歐問題中，東、西德關係應給予最大的注意。本（十二）月三日，東德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辭職，成立工作小組代替，何內克及其他十一名高幹被逐出黨，廿萬黨員退黨，二百萬東德人在這一天同時用手圍成一條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人牆以示抗議，要求民主，與東、西德統一。西德總理柯爾在美、蘇馬爾他高峰會議前提出先成立邦聯後，再成立聯邦的建議，但已遭到蘇聯及波蘭所發表的反對聲明。雖然美國略表贊成，但英國則還未有所表示。東、西德要是統一，對世界影響太大，目前要統一還是很困難。我們對東、西歐問題應先注意東、西德發展的方向，這是第一點。

其次，照目前看來，我認為東、西德的統一是一次要的，而東德的民主却是必要的。但實質上，將來的發展，統一問題要

重於民主問題，然而現在大家認為東德很開放，走民主路線，似乎是過度樂觀，這是就它目前的形勢來看。現在我把問題歸納一下：

一、中共對東歐變局有什麼反應？至十一月卅日為止，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金桂華在答覆記者時表示，中共密切注視東歐情勢的發展，但對其內部情勢，我們不要干涉，也不要表示任何意見。可是我們希望與東歐各國都能在穩定地發展經濟，在自己的道路上發展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至於蘇聯將來用什麼方法來維持華約集團？我認為，現在要瓦解是不可能的，因為蘇聯和美國都不希望它瓦解，至於怎樣維持，我想，可能會發展成在不要共產主義這個招牌之下，國家之間做適當的尊重，外交路線走向務實，這是一個最好的方式。當然也要看戈巴契夫的態度。

二、放棄共黨，不放棄社會主義，這是東歐國家目前都已表明的，所以我們現在也不要太過於樂觀，因為他們還有相當遠的路要走。

三、東歐的變局力量一定會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引發劑。中共不敢報導，可是終究是掩不住的。

最後，我們究竟該如何做呢？我認為應該同他們繼續進行經濟上的來往，而不要觸及政治上的關係，因為如果想在政治上動動手腳的話，可能會落得不償失。

陳一新先生（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

蘇聯想採取類似美國的作法。國際體系在西方原是階層式的。在二次大戰後，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都接受了美國的指導，或類似的援助，包括馬歇爾計畫。但是後來美國體認要圍堵共黨，就必須讓西方國家先達到自由、和平與繁榮。根據馬歇爾計畫，幫他們復興起來。這種情況也適用於蘇聯，因為關係到它是否能在下一個世紀成為一個超強的局面。目前，東歐國家已成為蘇聯的負擔，而非資產，所以要讓東歐自行發展，把層級體系，變成非層級式組織，東歐國家的繁榮民主對蘇聯來說反而是最安全的，但也要看戈巴契夫是否改革成功。現在蘇聯的策略是讓東歐國家通通變革。一方面對所有東歐國家的影響相當大。剛開始時，波蘭最先響應，匈牙利也跟著響應。東德起先反對，接著何內克被趕下臺，其他的如保加利亞，蘇聯不要她改革太快，說她沒有資格改革太快，要慢慢來，到最後，蘇聯才讓她改革。目前，尚未要阿爾巴尼亞改革，蘇聯大概認為阿爾巴尼亞對她不是很重要。在這種政策上，蘇聯本身也要推動成功的改革。蘇聯的一些學者表示，他們在戈氏的改革政策下很排斥極權，史達林主義，因為政治控制經濟自由，並非符合蘇聯之要求。他們也排斥全面民主，因為做不到，他們也認為要放棄軍事優勢而走向經濟大國雖有可能，但不願這麼做，因為對蘇聯來說將無法自保。最後，只有一種可能便是在政治穩定中求改革，發展民主。目前蘇聯人代會雖是部份民選，但有百分之八十是共產黨員，為共黨所控制，而當共黨控制比例減少時，這種模式慢慢可以為西方所接受。另外在經濟上走向自由，但也不會完全放棄社會主義，這可以讓她維持一個社

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還有，儘管有人說意識形態已經死了，但對中蘇共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我們仍很難預料。即使中蘇共雙方已舉行過高峰會，實際上這種和解是種貌合神離的狀態，如果雙方仍是各走各的路，那麼這種和解在將來也是有極限的，除非中共更重走向改革的道路。因此，我們除了民主化之外，更要繼續發展經濟，以擴大對大陸的影響力。與大陸做對等式的交流並無妨碍，另外還要擴大對越南及北韓的影響，在中共鄰近國家建立關係，也能對中共形成壓力。

主席：

東歐這段時間變化很快，有人認為這是自下而上的變革，人民的要求非常強烈，上層就發生很大的改變。今年春天，在大陸也有很多的青年人、知識份子、甚至中共黨員、機關幹部，要求改革，可是上層也有變化，不過是向另一方向變化，不知今天在座者對此問題是否能提出思考與分析？

趙春山先生（國研中心副主任）：

基本上，我認為，東歐發生這次改革不但可以提供給共黨國家，甚至若干第三世界國家做參考，這個改革具有幾點意義：

一、現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順民者昌，逆民者亡。有人說，是戈巴契夫的影響，有人認為是戰後西方國家的架構理論及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但我認為，這最重要的動力還是來自於人民，來自於其內社會環境，而非來自外社會環境。這個內社會環境，包括了該社會中的工人、知識份子、宗教等。換句話說，這個內社會環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自東歐各國的執政者、統治者，包括共黨領導階層的觀念皆非常新。如果是來自人民的力量，而在上者用壓制的手段，那麼改革仍不能順利的進行。可是東歐的許多改革者，包括波蘭的共黨領袖賈魯賽斯基的觀念都很新。既使波蘭舉行公民投票，賈氏還是會當選；因為領導階層願意採取改革，所以這項改革一定是由上而下的。來自人民的力量固然是重要，但最主要的是，執政者已發現，如果不改革，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三、東歐的改革在六十年代已開始，但均未成功之原因在於沒有涉及到黨、政官僚的利益。可是現在的改革，從政治改革開始著手，而且特別是從共黨內部的改革開始著手，這也給我們一個啓示：黨的改革分成三個方面：

（一）觀念：改革要從觀念著手，這是戈氏在其著作「改革與新思維」中特別強調的。

（二）人事：不行的人，全部換掉，從上到下一起換。

（三）結構：像匈牙利連國號都改變了，共黨的名字也改掉不要了，而改成社會民主黨或是社會黨。

所以歸納起來，這三方面的改革，很值得共黨國家及非共國家，想要改革成功的國家，一定要從這三方面來著手，否則就會面對民衆的壓力。

自史達林死後，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已不再是帝國與附庸，我們不能再用這名詞來形容。雙方的關係已變成了討價還價的關係，雖然蘇聯仍維持一個主宰性的影響力，但在許多地方要做出讓步。所以，在東歐與蘇聯的關係上已經改變了。蘇聯現用四個方式來整合東歐各國。第一是軍事，透過華約。第二是經濟，透過經互會。第三是意識形態，透過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第四是黨政接觸。每年蘇聯與東歐各國共黨的書記都舉行定期會議；此外，各國共黨領導人，經常相互訪問。它們相互派遣代表團，參加彼此的共黨大會。但目前這四個因素一一發生問題，我判斷今後要加強兩方面，一是黨政方面的接觸，另一是經濟整合。我們不可否認蘇聯集團內的貿易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有一點最重要的，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那便是蘇聯與東歐間的地緣政治的關係，這個關係絕非東歐與西方及美國之間所能比擬的。

尹慶耀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我認為東歐改革的動機有三點：

一、廿一世紀是綜合國力競賽的世紀，具有高經濟、高科技的國家就能獲得優勢，蘇聯、東歐、因為經濟停滯，科技落後西方達十至廿年，若再不加以改革，將被淘汰。

二、戈巴契夫的改革及發展戰略即為加速戰略計畫。

三、共黨獨立改革與發展，若不藉助西方資金、科技，則不可能達成，亦無法壯大社會主義陣營。

其次，就其改革範圍而言：

一、東歐與蘇聯之改革均在社會主義範圍內發展市場經濟。

二、蘇聯允許東歐自主，但不允其脫離華約組織。

三、這次改革雖出現政治多元化，但不影響其共黨領導。

再次，東歐的改革也帶來若干問題：

一、改革的步調已超過預期的範圍甚大。

二、東歐的改革不一定是由上而下，反可能會被民衆拖著走。

至於東歐改革的前途充滿了喜悅與不安：

一、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基本方向是正確的。

二、困難仍多。匈牙利外債有二百億美元，波蘭有四百億美元，西方的援助只能救急不救貧，因此改革中間頻生罷工，

加上民族意識的抬頭等，引起動亂，將更增加經濟困難。

三、東歐新政權難以迅速滿足人民欲望，政治能否再維持安定？

四、西方亦希望東歐在穩定中改革，倘若東歐暴亂迭起，蘇聯與西方目前尚不會介入，但其立場與對策值得注意，尤其最近蘇聯已將二個空降師歸撥國安會運用，是否意味蘇聯的不安與反應。

五、雅爾達體制已造成不安與困局，今後是否可能結束，又新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的发展趨勢難以預料。但可知者是羅馬尼亞、中共、北韓等必難長期堅守馬列體制。所以，東歐改革若步調放慢，則蘇聯尚能控制，但我們應勿過份樂觀。

周陽山先生（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客座教授）：

東歐改革方向是：

一、在政治體制上，從國家社會主義走向民族社會主義。

二、在意識形態上，是由科學共產主義走向較為自由與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

今年七、八月間，波蘭的一位學者考魯塞斯基指出，波蘭「團結工會」在八〇年時有會員八百萬，至目前成立政黨時，只剩下二百萬人，代表了內部凝聚整合力量的衰退。在匈牙利方面，匈共與相關政黨分裂為四個組織：匈牙利社會黨、民主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及愛國聯盟等。今日東歐是否能如期的迅速改革，受內外兩大因素的影響：

一、外在因素：

(一) 戈巴契夫是否持續改革，及改革能否成功？

(二) 蘇聯在東歐的數十萬駐軍，是否能在短期內撤除？

(三) 東歐各國原有三分之一的外貿是來自蘇聯；因此，東歐在經濟上仍受蘇聯相當大的控制。

(四) 歐美各國協助與合作的誠意是否足夠？

二、內部因素：

(一) 東歐內部改革派的共黨及其他黨派人士能否處理其國家內部經濟情勢？

(二) 民主化與列寧主義遺產的合理轉化問題。例如，負責國家安全的特工、和工廠、學校的黨組織是否在短期內獲得安排與出路？

陳力生先生（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

東歐變局的意義在於：

一、東歐的變革是漸變與突變的合一，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壓力發展到一種覺悟。我認為是場不流血革命。這些共產黨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準備走向一般的社會主義，也嚐試西方的民主運動。

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沒落，民主潮流是大勢所趨。

東歐變革對中共的影響在於：

一、東歐變局已震撼了整個共產世界，對中共當然有很大的衝擊。中共似乎已陷於驚慌失措。當波蘭、匈牙利開始變革時，中共則提出彼此國情不同，因此仍強調四個堅持。「六、四事件」之後，李鵬在國外接受記者訪問時曾避重就輕，因此東歐改革模式是否在大陸發生，實不甚樂觀。因為中共領導人並未如東歐共黨領導人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我認為，到第三代領導人上台時，在內外情勢與潮流衝擊之下，民主政治將可能會出現。

我們對東歐變局的態度與對策是：

一、我們應加強與東歐國家的關係，如觀光、文化交流等。

二、我們應進一步討論現階段的大陸政策，尤其我們要注意東、西德的關係，海峽兩岸的關係是否可以吸取其經驗。

賴金男先生：

以研究未來學的觀點看，我認為說東歐是貧窮的並不正確。東德人民的年平均收入是一萬二千五百美元，而小汽車的數量是每百戶有四十五輛。問題是東德或波蘭人民為何要爭取自由？因為東德人民每百戶只有五臺電話，所以他們要爭取的是言論自由。

其次，中共與東歐變革之間並無骨牌效應的存在。

第三，外匯問題是個抽象的名詞，東歐的外債已擺脫了過去周期性反抗的變化，進入了結構性的變化，從量變到質變，東歐的農工人口已少於非農工人口；因此，工農專政已無意義。

曾永賢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兼任副教授）：

最近幾個月的東歐變局，促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更進一步的沒落與瓦解。衆所周知，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建立共產國際以後所形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其最大特點為嚴格要求其內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統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出現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向最高峰。雖然一九四七年發生了南斯拉夫的叛變，歐洲共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共黨事件，但由於史達林向東歐共黨下令整肅狄托份子，防止在東歐共黨中出現類似狄托事件，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遭到嚴重影響。可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之死，却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既有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日趨鬆塌、變質乃至瓦解。

卅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政治路線上的「向右轉」是非常明顯的。就蘇聯而言，自赫魯雪夫時代起就不得不採取不同幅度的改革，雖然有布里茲涅夫的「新史達林主義」時代，但總的趨勢是走上改革、緩和。戈巴契夫上台後提出「新思維」，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在東歐各共黨國家，如一九五六年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

格之春」、八〇年代的「團結工會」運動所發出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幼苗，並沒有給共黨專制統治連根拔起，反而使她的意志力和鬭爭力更加堅強，東歐各國的這種滔滔不絕的民主和自由的潮流，都各有其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背景和條件。另就外在因素而言，不可否認的是戈巴契夫所宣布的「不干涉」、「不介入」政策，以及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發揮了強而有力的催化作用。

在共黨集團「向右轉」的浪潮中，中共始終站在「左」的立場，也是非常顯著的事實。一九五六年，當匈牙利反共抗暴事件爆發後，毛澤東強烈要求蘇聯對之實施軍事鎮壓，在對內政策上強行「三面紅旗」政策；一九五七年以後的反蘇鬭爭，六〇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馬列主義的正統自居，推動分裂運動，組織「反蘇修統一戰線」等等，無一不是站在「左」的立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掌權後，雖然決定要從事經濟改革，但在政治路線上卻沒有放棄毛澤東時代的「左」的立場，諸如：一九七九年元月，鄧小平提出「四個基本原則」；一九八〇年鎮壓「北京之春」，逮捕了魏京生等；一九八三年發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一九八七年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犧牲了胡耀邦；「八九民運」初起時，立即宣布那是「動亂」、「暴亂」，實施天人所不容的大屠殺。

中共對近半年來的東歐民主浪潮，初期故作鎮定，裝聾作啞，自十一月以後，開始加以批評，如鄧小平與尼克森會見談及東歐問題時表示：東歐和蘇聯目前的變動，只是暫時現象，並提醒美國人不要高興得太早。十一月十六日，李鵬訪問巴基斯坦時回答記者說：「現在東歐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是好是不利，還要仔細的觀察。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是毫不動搖的，不會因為歐洲所發生之事件而改變我們的政策、制度」，江澤民在十一月廿八日的省、市、區黨報總編輯新聞工作研討班上，指責戈巴契夫是「當前東歐民主浪潮的始作俑者」。

中共對東歐變局的言論反應較含蓄些，可是在行動上却至為積極。除在對內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推動堅持四個基本原則教育和毛澤東思想學習運動，以及強化社會控制，收縮改革幅度以外；在對外活動上，加緊同北韓、羅馬尼亞、古巴等共黨國家中的死硬派共黨之聯繫，特別引人注目。十月，中共「外長」錢其琛訪問古巴，經協商後決定卡斯楚將於一九九〇年二月訪問北平；十一月初，金日成祕訪北平，鄧小平還親自前往北平車站迎接，商討因應東歐變局對策作為會談主題之一；十一月下旬，羅馬尼亞共黨舉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中共派出掌管特務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喬石前往參加，除表全力支持羅共強硬立場外，還就鎮壓「八九民運」交換意見，傳授經驗。

顯然，在東歐制度中，中共仍站在「左」的立場，正積極拉攏北韓、古巴、羅馬尼亞等死硬派共黨，妄想做傳統馬列主義和共黨專政體制的「逆」流砥柱。東歐改革中的國家之共產黨中存在少數死硬派分子，當然，也是它所要拉攏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向右轉」潮流中，以中共為中心的反潮流勢力雖然擋不住民主自由的狂浪，但是如果戈巴契夫改革失敗

，導致其失勢，東歐各國的經濟情勢繼續惡化，即使無法復辟，也可能出現反覆鬭爭，造成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大阻力。

至於對中國大陸的民運前途而言，東歐的反民主浪潮，必然沖向東方，對暫時被壓制下來的大陸民運是莫大鼓舞，但是中共站在「左」的立場，加強對大陸的專政統治，全力防範「和平演變」的情勢下，期待大陸民運的新高潮不久即將到來，似乎是過於樂觀的。其前途固然光明，但是還要走一段更艱難的路。

裘孔淵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首先，對東歐的變局我有幾點看法：

一、四十多年來，中共的行為是作為馬列主義的中流砥柱，但對東歐的局勢影響不大；反過來，東歐一波波的改革風潮對中共的影響很大。

二、東歐的變局是一種質變，這種結果也是東歐人民經過長期奮鬥的結果。

三、二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可否認地發揮了其生命力，而社會主義相形失色，因此在意識形態上發揮很大的影響。

四、大陸民主運動的前途，必受東歐之影響，而產生鼓舞與促進的作用。因此大陸下一波的民主運動可能比我們預期會早一點到來，主要是流亡歐美的大陸精英分子親身體驗了這種變革的氣氛與事實。另外儘管大陸領導人對人民封鎖消息，但是黨內不可能封鎖。

在目前歐洲國家的人民似呈樂觀浪漫氣氛，但我們認為還可能出現一個暫時的曲折反覆，值得我們警惕的。但從世界的大潮流來看，是令我們樂觀的。

一、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內在重新進行整合，如匈共。

二、東歐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內。

三、共產國家的共產黨可能在不久將來於莫斯科開會進行國際性的組織及團結。

四、東歐共黨國家似乎仍支持社會主義。

五、中共至今仍在頑強的抗拒世界大潮流，從短期看，民主運動仍遭到殘酷的鎮壓，但從長期來看，它是不可能繼續來阻擋潮流的。

對我們來說，我覺得中共對我們始終保持一個強硬的態度，這是在制訂政策時要注意的。

王章陵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關於東歐變局對中共的影響，我想就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與影響這一點來加以說明。

自馬克思死後，對它思想的詮釋，從伯恩施坦、考茨基、盧卡奇到新馬克思主義，這是一條西方的發展路線，而從列寧、史達林到毛澤東，這就是東方的一條發展路線。西方的發展取向較為理性，今天東歐變局就是這一取向的延伸，而東方，則堅持馬克思階級鬥爭及階級專政的理念，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相對立。從歷史看，西方總是影響東方，像盧卡奇思想，早在五十年代即影響胡風、巴人及王叔明，而有人性文學與反文藝霸權之抗爭。八十年代，又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大辯論，像五十年代的波蘭、匈牙利的抗暴，曾立即在中國大陸青年階層得到回應。而東歐的經濟改革，毫無疑問地正是鄧小平修正主義形成的影子模型。不過，來自東歐的西風，曾為毛澤東所排拒，即在鄧小平，從整肅胡耀邦、趙紫陽到「六、四大屠殺」，其要求「四個堅持」，要求東風壓倒西風的政治立場亦不變。因此，儘管東歐變局對中共的影響有其必然性，但這影響似非立竿見影。因為：

一、當今中共老人領導階層仍堅持東方馬克思主義理念；

二、中共擁有十億人口，但無論經濟、文化上走向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都沒有構成；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權力大餅、不願捨棄，則惟極權是最佳統治工具，當今，如欲中共接受東歐模式放棄極權，走向民主開放，殊屬奢望。

蘇起先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我想把問題抽象化一些。對東歐問題，我認為任何國家要發生這麼大的變化相當不容易，而要這麼多國家同時在半年內發生這些變化更值得我們深思。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單一的因素所能解釋的。基本上我把它分為內、外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目前美、蘇和解架構下，蘇聯的政策改變，這是最根本的因素。這個基本架構提供了東歐局勢的改變。至於東歐內部也正反映了變革的潮流，並可歸為四大潮流：一、和平；二、經濟發展；三、民主化；四、民族主義。由於這四大潮流同時發生作用，所以更加凸顯了東歐的變局。也有其他不少國家發生變革，但因缺乏這四大潮流中的某一項或者某兩項，以致也顯得平淡無奇。而另一方面，四大潮流因素中的某幾項若能支持一國的政權，也能使之平安過關。東歐這四大變革因素其實早有現象產生，但之所以呈現今天的局面，也不能不歸因於外在的環境；也就是東歐各國的精英分子在蘇聯領袖的地位尚未全然穩固時推動改革，同時他們也受到戈巴契夫改革理念的鼓舞，也更加快了行動的脚步。

至於對國際局勢的影響方面，我認為對東歐的影響，可以從這四個潮流的發展來看，一方面是影響了華約與北約尖銳的對峙，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傳統武器的裁減。在經濟發展方面，我非常同意，東歐是想丟掉共產主義，但並沒有丟掉社會主義。民主化的潮流使它的權力更加分散，所以其發展仍是在摸索的階段中。而民族主義將來勢必引起東歐國家更多問題。

另外我認為東歐不可能在短期內退出華約，因為東歐各國的反對黨或非共黨的黨派人士也知道，他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為戈巴契夫的理念及容忍，所以，他們不致於過分刺激蘇聯。而今後華約與北約也會透過對話方式來逐步達成裁軍。至於

整個歐洲的局勢，會恢復到二次大戰前的情況，也就是是一個權力政治，而意識形態會逐漸減少，歐洲各國會變成蘇聯與德國的緩衝國家。

東歐的變化可以加強美、蘇和解的關係。蘇聯本身希望透過這種變化來緩和和西歐對它的顧慮及增加東、西歐的和解，然後排除美國的因素，把柏林圍牆移到大西洋岸，將美國擋在牆外。另外在主觀願望及客觀體制上，美、蘇關係都會好轉。但目前中共的發展，將使它比以前愈加孤立。

葉陽明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世界政治是在動態中演變，而東歐的局勢更屬動態中的動態。它對世界政治有若干特殊意義：

一、東歐共黨內部的改革已顯示，他們已慢慢放棄過去一黨專政、權力壟斷的局面，而出現權力分享的觀念。也不堅持一黨領導，而走向政治合作，經濟分享的形勢。但中共仍堅持一黨專政，可歸結於中國的政治文化特色，即只准有一個老大，其他的都必須聽話，而無權力分享的觀念。但東歐國家共黨雖是共產黨，却畢竟是歐洲人，他們會為了整個國家長遠的利益著想，也準備權力分享，也願意權力分享。反觀中共，在古老的政治文化影響下，目前仍是在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偏右的作風。

二、另外共黨內部的自我批判及權力分散是這次東歐變革的特色。軍隊不再是壓抑民主運動的工具。一九五三年蘇聯以坦克壓制東德的民主運動，一九五六年鎮壓了匈牙利，一九六八年鎮壓了捷克，這次中共也是用軍隊來鎮壓民運。但自戈巴契夫上台之後，做出新的姿態，對東歐的局勢抱著觀望的態度，而始終沒有派出軍隊來鎮壓，這也是東歐能推動改革的基本動因。針對東歐的變局對歐洲的政局來說，德國的分裂與對抗使東西方的陣營與對抗也變得明顯。如今，東德開放圍牆不完全有利於東德，但對西德柯爾政府明年的選戰有利。

對我們而言，東、西德發展也許在五年內統一，但對我們是很大的挑戰，我們要採取什麼模式或作法？我們必須想出一套應時的對策。

主席：

我想就各位先生的高見，提出幾個問題來就教：

一、從今年春天中共軍隊鎮壓民運來看，為什麼東歐能坦然面對政權的危機，而其既有權力者在面臨下臺時不動用軍隊？是不能，還是不願？

二、西德的基本法主張兩德以自由、自決的方式來加以處理，目前雖不可能，如果排除國際因素，只把兩德孤立來看，是否有可能統一？

葉伯棠先生：

剛才蔡教授談到東歐和平演變是符合「滙合理論」。個人並不全然同意這種看法。「滙合理論」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流行。最初提出這個理論是廷柏根、阿宏、蓋爾布魯特、史勒辛格、史文森、威爾斯和藍吉爾。東歐學者如：布瑞吉爾、布滕柯、達林、芮萊、羅斯和瓦衣達等都提過這個理論。這個理論從後工業主義理論、經濟政策、企業經營，甚至產權等因素發展來判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有滙合的可能。現在證明這個理論並不符合，兩個制度發展結果，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失效，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兩個制度無法滙合的主要原因，不是經濟制度的原因，而是政治文化的原因。簡單說，在列寧主義形成為政治文化，出現新階級，壓抑人民的生產力，導致經濟衰退，列寧主義政治文化無法與個人自由競爭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對抗，政治文化截然不同，使兩個經濟制度無法滙合，出現東歐今日的制度，因此只有放棄共產主義制度。

蔡政文先生：

葉先生對滙合理論的瞭解與我的瞭解不太一樣。滙合理論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開始的。劉貝爾、雷蒙阿宏、廷柏根等都曾討論過這理論。它有兩大定義：一是指東、西方的制度都要修正，而且逐漸接近；另一是指兩種制度結合為一種新的制度，雙方都很像。因為當時在冷戰時期，兩大集團希望降低對立而不發生戰爭。

其內包括了工業本質的改變，就是功能主義理論及政治發展理論這兩大支柱的改變，因為他們覺得用經濟去幫助東歐的經濟改善生活的程度，可以帶動社會結構的轉變，才會產生自由化，等人民爭取了自由化，才有可能讓彼此來談更進一步的要求。所以在一九七五年的歐洲高峰會議裏，整個歐洲就在問到底會不會滙合，到處也都在談此一問題。我發現滙合與否主要仍操縱在兩大超強之手。然而對中國的限制比較少，因為中國有共同的文化，雖有超強在，但亦不明顯；若真能滙合時也就比較容易能達成統一。目前西方用和平改造作為改變東歐的策略似乎有用，雖慢慢接近，但並非滙合，而即使滙合也不一定會有永久的和平，也不一定會統一。

洪茂雄先生：

首先，就為何東歐不使用武力解決內部危機的問題來說，有三個理由：

一、波蘭經驗行不通，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蘭政府儘管頒布「軍管法」，一時鎮壓了「團結工會」，但依然解決不了波蘭的內部危機。

二、蘇聯在東歐國家駐有重兵（東德駐有卅八萬大軍，在波蘭及匈牙利均有三個師，捷克有七萬餘兵力），對東歐共黨政權有掣肘作用。戈巴契夫反對使用武力解決內部問題，避免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東西方和睦關係。

三、北平「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教訓，得不償失，不該重蹈覆轍。

其次，就東、西德的統一在排除國際因素後的可能性來說，東、西德雙方，目前對德國統一問題的態度，仍然相當的分歧。自從柏林圍牆開放之後，雙邊的德國人對德國統一的看法，互有消長，東德各黨派基本上是反對統一的。看來，「德國再統一」的目標，註定是走在一條漫長而無法預期的道路上。

畢英賢先生（國研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首先，就東歐共黨國家變化的基本原因來談：

一、資訊發達，這點很重要。不論是中共、東歐、蘇聯，從前聽不到的消息，現在聽得到。

二、教育程度提高。現在共黨國家內的人民，因知識水準提高，而能對「共產主義的天堂」作一判斷。同時，由於對政治參與興趣的提高及對經濟改善的期望提高，也有助於改革的推動。

三、社會主義並非無用，它在五十年代也曾發揮相當的作用，但至今，社會主義已至極限，無法突破僵局。

其次，就華沙公約的問題來說：今天國際秩序已維持了四十年，如把華約廢掉，則將發生世界亂局。這種體系平衡的失却，將讓兩大超強無法控制。何況今天美、蘇兩國早已達成諒解，蘇聯早已明說，不能讓蘇聯失去安全上的保障。

第三，有關於國際共產運動的問題：

一、共產運動已經衰落了。

二、共黨國家是否想挽救自己？是的。在九月底開了兩次共黨書記會議，第一次是在東柏林，討論意識形態；第二次是在保加利亞的瓦拉，討論共同對外關係。最基本的是研究如何以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以解決當前的困難。據蘇聯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梅德維捷夫表示，他們對當前的局勢已有了一個很廣泛的概念與結論，及解決問題的基本架構。雅柯夫列夫說，共黨國家在解決問題上是多元性的，唯有如此才能去除教條主義的弊端。將來意識形態仍相近似，但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

三、國際共黨運動不再有中心。

王章陵先生：

中共使用武力鎮壓的成功因素在於：

一、武力無法對付羣衆，但可以對付知識份子的革命，因為在大陸要革命的均是知識份子。

二、當前大陸的政權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大陸只有共產黨，如果它垮了，那麼由誰來取代它則成為一個問題。

孔令晟先生（私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個人以為：

一、根據蘇教授剛才所談的外在環境包括：超強關係的緩和、經濟和政治自由是世界性的潮流。由於戈巴契夫本人推動的改革及新思維，對東歐某方面的放鬆，所以構成了外在的因素。

二、根據賴教授表示，目前東歐的經濟情勢不錯。但在十一月十一日出刊的英國經濟學人周刊，第一篇文章即談到一九九二年的歐市整合將帶來預期的高成長，巨大的財富使得東歐向西轉。東歐希望加入西歐的單一市場而整合為全歐市場，但因西歐認為，東歐經濟落後，所以目前是否能接受它們成為會員，將須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如果是這麼看的話，將與賴教授的說法有出入。

尹慶耀先生：

一、在自由國家與共黨國家的國民平均總生產的算法不一樣。共黨國家是公有財產，而自由國家是私有財產。共黨國家的錢是在政府手裏。現在，波蘭等國却形成目前以債養債的局面。蘇聯是第二超強，但民生必需品也極為缺乏。

二、華約總部在莫斯科，華約的一切控制均在蘇聯人手中，所以只要華約存在一天，蘇聯的影響就會存在一天。

三、關於經互會，蘇聯的國民經濟體系自成一體，但是經互會各國却相互依賴，要想脫離，並非容易。同時，東歐、蘇聯國家間的貿易是以物易物，若是脫離，也是不易，另外東歐的石油、電力是由蘇聯輸配，要想切斷這些供應，除非東歐所願。

吳安家先生（國研中心研究員兼中國大陸組副召集人）：

我想談談東歐國家改革對中共的影響：

一、領導人的意願究竟高不高？從目前來看，中共的領導人沒有一個願意接受東歐國家的改革方式。

二、比較之下，中國大陸的人民民主意識不如東歐人民那麼高。

三、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是屬小農經濟結構，這種只要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以也使得人民造反不易。又目前中共在強調懲治貪污腐化，及解決農業問題的重要性。

四、軍隊的態度也很重要，因為它是中共政權的工具，所以才會去鎮壓人民。

劉榮座先生（經濟部國貿局科長）：

我想談談我們對東歐變局應有的做法：

一、在貿易政策方面，東歐朝開放、自由化市場發展，我們為了分散市場及積極爭取東歐市場，目前已開放與東歐的直接貿易（蘇聯與阿爾巴尼亞除外）。

二、在人員交流、外匯、電信來往等方面，政府已採取放寬方式辦理。

三、在實際貿易方面，根據海關的統計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對東歐的出口增加百分之九二點三，進口則降低百分之十五。而我國與東歐的貿易額，今年前十月是二億四千三百四十萬美元，占我國總貿易額的比例極低，因此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四、目前的作法是鼓勵及協助廠商前往設立辦事處、分公司，並積極組團前往考察訪問，及增加相互訪問的機會。

王兆徽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教授）：

首先，就東歐國家改革的方向與限制方面來看：

一、東歐各國目前的改革，由於政治基礎不穩固，應慎防共黨的反彈。

二、東歐各國經濟上都有通貨膨脹問題，加上外債又多，如不能獲得大量外援，積極穩定國內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則改革前途並不樂觀。

三、東歐國家改革之成敗與戈巴契夫改革的成敗有密切關係。如戈氏失勢則直接影響東歐國家之改革。

其次，就我們應有的態度與對策方面來看：

一、應積極拓展對東歐之貿易，以達到分散市場之目的。

二、應積極鼓勵國人前往東歐各國旅遊，除加深瞭解各國國情外，並可以增進民間友誼。

最後，在加強對東歐的研究方面；除積極培養東歐語文人才外，尚可採取下列方法：

一、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增加對東歐研究的人員。

二、為培養東歐語文人才，應增設公費留學生，並遴選國內各校俄語組畢業生前往東歐各國深造，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八、結 論（主席）：

今天下午非常感謝各位學者專家來到本中心，給我們很多的指教。東歐的變局可能是不歸路，其實東歐也有很深厚的人文主義的傳統，本來與極權共產主義的潮流並非符合的，再加上宗教的傳統等等，如果蘇聯對它的控制能放鬆，而其他國家對它能放心，它是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當然，東歐的變局對東、西方關係及整個國際社會是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我們所寄望的是東歐國家由於現在體制改變而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對和平、繁榮都有長足的貢獻，我們也應加強對東歐的瞭解與接觸，使我們也在新的潮流得到互惠的結果。今天謝謝各位，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

*

*